

# 市场化转型中的城市女性失业： 理论观点与实证发现<sup>\*</sup>

张展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研究, 现有文献涉及了根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性别歧视和旧的国家再分配体制与新兴市场机制的交互作用。围绕就业(失业)的性别不平等, 归纳、提炼理论观点, 提出研究假设, 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显示, 在两性就业差异上, 没有发现性别歧视的作用; 旧的国家再分配与新兴的市场机制对失业性别差异的交互影响作用于中低学历女性劳动者, 而且这种作用是暂时的。这意味着, 性别不平等的“自身逻辑”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关键词:** 经济转型; 性别不平等; 劳动就业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346(2004)01-0001-09

## Unemployment of Urban Women in Market Transi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ZHANG Zhan-xi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AS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n the literature on gender inequalities in labor markets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attention has been drawn to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rising market mechanisms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old-fashioned state redistribution. With the focus on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cit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oretical views, formulates research hypothesis,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sample data of China's Fifth Population Census in 2000. It finds that as market transition has considerably deepened, there is no sign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effect on employment inequality, and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state redistribution with market mechanisms on gender inequality in employment restricts to urban female workers with middle and low-level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and tends to diminish. This im-

<sup>\*</sup> 舒晓灵曾对本文的实证分析提出一些重要建议, 在此致谢。

收稿日期: 2003-11-17

作者简介: 张展新(1955—),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plies that research interests in this field may turn to the inherent logic of gender inequality.

**Key words:** economic transition; gender inequality; employment

随着市场化导向改革的深入,分配和就业等方面的不平等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学者和政策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这一领域,性别不平等是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归纳、提炼有关性别不平等的理论观点,推断两性就业(失业)差别的假设命题,利用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形成结论。

### 1 关于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观点

在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是否扩大了?如果是,其原因是什么?从现有的文献中,可以总结、提炼出三种理论观点。经济学家 Liu 等根据劳动力市场理论,论证了影响中国转型时期工资性别歧视的两大因素:传统文化和市场竞争(Liu, Meng and Zhang, 2000)<sup>[1]</sup>。当企业成为经营主体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歧视将影响雇主或经理,使得女性雇员的报酬低于具有同样生产力的男性雇员的报酬,从而产生收入的性别不平等。但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是短期的。在充分竞争条件下,不歧视女性的雇主可以取得劳动投入的相对成本优势,使歧视女性的雇主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长期趋势是,市场竞争弱化、消除基于传统文化的两性收入差异。这一观点隐含着一个关于性别不平等的一般性命题:在经济转型中,由于传统文化和市场机制先后起支配作用,性别不平等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这可以称之为转型时期性别不平等的“文化歧视—市场机制互动”观。一些社会学家对中国城市的观察是:随着作为女性保护者的国家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在就业和就业岗位、职务提升、工资报酬等方面,针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歧视开始浮现(Lee 1995; Honig 2000; Hershatter, 2000)<sup>[2][3][4]</sup>。根据这些观察,可以提出关于性别不平等的第二种观点:改革削弱了计划体制下的国家再分配机制<sup>①</sup>,导致了劳动力市场歧视。另一些学者发现,在改革期间,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经济社会地位没有显著的趋势性变化(Zhou, Tuma & Moen, 1997)<sup>[7]</sup>,也没有与市场化程度相关的地区差异(Shu & Bian, 2002)<sup>[8]</sup>。这就形成了第三种观点:性别不平等有自身的逻辑,市场导向改革对其影响是非直接的和不确定的。

### 2 改革前的国家再分配对女性的影响

以上观点涉及到文化传统、国家再分配和市场机制这三种可能影响性别不平等的“基本力”,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照框架。但是,还有一个有关国家再分配的问题需要澄清。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实际上都断定性别歧视的上升,不过前者强调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市场竞争的主导效应,后者关注国家再分配机制对性别差异影响的弱化。二者都没有谈及与性别歧视无关的性别差异及其与国家再分配的关系。然而,忽视这一点可能导致对国家再分配功能的片面理解。

毫无疑问,在改革前,以劳动力的计划安置和统一的工资福利发放为特征的国家再分配体制在消除1949年中国革命以前的性别歧视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央计划时期,城市女性劳动力与男性一样,被纳入统一的就业、福利和保障体系之中,并在意识形态上大力宣传男女平等。这样,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城市妇女的就业率大幅度提高,并保持了较小的工资分配性别差异。到经济改革开始的年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男女劳动力两性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蔡 2003,第8章)<sup>[9]</sup>,说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不再支配妇女就业与收入。但是,还应注意国家再分配的其他作用。平均化的国家再分配压低了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使人力资本禀赋不高的劳动者实际相对受益,在收入和就业上都取得保障。在这类劳动者之中,女性受益程度还要大些。在计划经济时期下,中国实行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第三产业比重较低(Lin, Cai and

Li, 1996)<sup>[10]</sup>。这样的产业结构本来不利于妇女就业。在这种情况下, 同男性相比, 女性劳动者就业要更多地依赖国家; 为了实现妇女就业目标, 国家必须通过计划和行政手段, 人为地增加就业和开办企业, 安置女性劳动者。此外, 在就业场所内部, 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福利制度也忽略了女性劳动者在劳动供给上的“折扣”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男女“不同工同酬”现象(潘锦棠, 2002)<sup>[11]</sup>。在这两方面, 国家都要支付成本。这样, 国家再分配体制一方面矫正文化传统上的性别歧视, 使全体女性受益; 另一方面, 这种体制和机制为中低学历和能力的女性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和就业保护。

上述对国家再分配的剖析有助于判断转型时期性别差异变化的性质。如果变化发生在全体女性与男性的对比上, 可以考虑来自文化传统的性别歧视的影响和文化传统与市场机制的交互作用; 如果只能对部分女性——某些女性劳动者群体观察到性别差异, 则需要考察国家再分配和市场机制的此消彼长; 如果观察不到任何两性差异与经济转型的联系, 那么可以认为性别不平等与市场化无关的观点获得了支持。

### 3 研究思路

在 1978 年以前, 中国通过计划和行政手段, 为城市劳动者在企业和其他单位安排工作, 并终身就业。这样, 实际上, 国家为每个劳动者提供了就业保障, 因而也就“消灭”了失业。经济改革改变了这种状况。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特别是 90 年中期, 实行了较为激进的国有企业改革以来, 在城市中, 下岗失业工人的数量不断增长。90 年代以来的一些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显示, 女性失业下岗率较男性高(蔡, 2002, 第 8 章)<sup>[12]</sup>。这似乎意味着在经济转型中, 女性在劳动就业方面受到的冲击要大于男性。本文以就业(失业)的性别不平等与市场转型的关系为研究主题, 提出假设命题, 进行研究设计, 通过统计推断来分析两性就业差异, 以检验关于转型时期性别不平等的理论观点, 把握经济转型中劳动就业的性别不平等变化的规律。

#### 3.1 市场化的度量

考察改革中失业的两性差异, 首先需要度量市场化——市场经济扩张的程度。在现有的研究中国转型时期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文献中, 有三种度量市场化的方法。一是“趋势方法”——用时间作为市场化的代理变量, 把不平等和分层的趋势变化解释为市场化的作用。这种常用的方法实际上把市场化假设为一个线性过程, 这有可能使问题过于简单化; 在可利用数据方面, 也缺乏调查年份比较紧凑的问卷资料。二是“部门比较法”——用不同部门间不平等的比较来判断市场化的效应。例如, Liu 等分别分析国有部门、城市集体部门和私营部门中的工资决定并进行比较, 来估计市场化/私有化对工资差别的影响(Liu, Meng and Zhang, 2000)<sup>[13]</sup>。这种方法简单明了, 但是也可能忽略国有部门自身分化的影响和改革推进的地区不平衡性。三是地区改革相对进程的横截面方法, 即直接度量不同地区或城市在同一时点的市场化程度差异<sup>[14]</sup>。这要求有代表性的市场化指标, 同时需要样本量较大的调查数据。

本文采用第三种方法, 并采用一些经济学家建立的中国各地区(省、市、自治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樊纲等, 2003)<sup>[15]</sup>为度量指标<sup>②</sup>。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是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程度和法律制度环境这五类指标为基础构造出来的。1999 年相对指数表明了这一年度各地区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社会转型上的差异。

#### 3.2 研究时点

本文的研究时点为 2000 年。一种流行的看法是, 在 1995 年以前, 中国城市改革是温和的, 而后是激进的(Meng, 2001)<sup>[16]</sup>。因此, 到 2000 年, 市场化转型的情况是: 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先行者, 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实际处于市场化的“长期”阶段; 在改革相对落后的地区, 还需要在某些方面破除旧体制, 仍处于市场化的中期。这样, 不同地区之间在改革程度上形成了

巨大差异。这一“横截面”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改革进展的逻辑性的历时过程,为检验关于性别差异与市场化关系的理论观点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平台。

### 3.3 研究对象

由于城乡劳动力市场正在融合,目前在城市,从户籍和迁移这两个维度来看,有四个劳动人口群体。第一组群是持有非农户籍、(非外地迁入的)本地常住人口,这是城市劳动人口的主要成分;第二组群是持有农业户籍、(非外地迁入的)本地常住人口;第三组群是持有非农户籍、外地迁入的流动人口;第四组群是持有农业户籍、外地迁入的流动人口。户籍制度是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基础(蔡等,2002)<sup>[17]</sup>。农村人口早在80年代就独立于公有制组织,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外地迁入的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同非农户籍常住人口相比人数较少,各省分布很不均匀,而且远离旧的劳动制度安排,更深地卷入劳动力市场。这样,劳动人口第一组群——非农户籍本地常住人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中,而且更多地受到国家再分配的保护。而在不同的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同,这一组群的两性就业差异程度也可能有显著差别。因此,本文以这一城市劳动群体为研究对象,界定为所研究的“城市劳动者”。

### 4 研究假设

根据“文化歧视——市场机制互动”观,把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视为处于转型的不同阶段,则可以推断,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处在改革初期,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雇佣性别歧视随市场导向的强化而复苏、加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处在改革深化时期,市场竞争机制开始抑制文化歧视,并使这种歧视加速消亡。这就提出了假设命题1: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由低到高,两性就业差异先升后降,呈现曲线关系。

假定文化性别歧视不再发挥作用,只考虑国家再分配与市场机制的碰撞,则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在国家再分配体制下,城市中的中低学历女性劳动者相对受益最大,国家为其支付成本可能比同类男性更高,当市场经济取代国家计划、国家不再作为生产和分配主体、下岗和失业成为国有单位的可行选择时,她们被推向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更大。而对这部分习惯于国家安排的女性劳动者来说,面对急剧推进的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有一个“适应期”,即在失去原公有制单位的工作之初,不能积极地直接面对劳动力市场,而是继续依赖政府机构和原单位来争取重新就业。另一方面,新兴的劳动力市场也是随着整个改革进程的推进和经济发展而扩展、深化和完善的,一开始可能没有创造出大量的适合城市女性的就业岗位。在市场化改革大幅度进展之时,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变化:中低学历的女性劳动者逐步适应了新的形势,而劳动力市场也在不断扩张和细分。当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显著改善了,女性的高失业就会下降。简而言之,这类女性劳动者将从最初过分依赖国家、受到市场化的猛烈冲击,逐步走向适应市场、把握市场机会。因此,可以提出假设命题2: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由低到高,中低学历城市劳动者的两性就业差异先升后降,呈现曲线关系。这一命题的隐含命题是:高学历劳动者就业的性别差异与地区市场化进程无关。

### 5 数据、变量和统计模型

实证研究利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0.95%抽样数据<sup>③</sup>。这里只选择年龄15周岁以上、目前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或失业)并常住城市非农户籍常住人口样本<sup>④</sup>,形成一个用于分析的数据集。基于研究目的,定义了三组虚拟变量:(1)女性(女性=1,男性=0);(2)年龄,包括“15至25岁”、“26至35岁”、“36至45岁”、“45岁以上”四个变量;<sup>⑤</sup>(3)教育程度,包括“小学及小学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及本科以上”六个变量。以上是微观层面变量,此外还有前面选定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这一宏观层面变量。最后,是一对反映女性和市场化进程的交叉作用的变量。由于女性与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的乘积这一变量与女性这一虚拟变量之间相关程度较高

(Pearson 系数大于 0.9), 构造了另一个度量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变量: 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与相对指数中位数的差。这里, 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中位数为中国中部内陆省份——湖北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 5.45。这一变量的值就是一个省份与处于“市场化中游”的湖北省相比, 市场化水平的相对差距或超前程度。然后, 定义两个微观—宏观交叉变量: 女性  $\times$  (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 - 5.45); 女性  $\times$  (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 - 5.45)<sup>2</sup>。构造这两个交叉变量是为了考察失业上的两性差异是否随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变化而变化; 引入了女性与市场化程度变量平方的乘交叉变量, 是因为考虑到两性失业差异与地区市场化的关系可能不是线性的, 而是曲线的。

统计分析使用失业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 估计“失业”事件发生比( $P/(1-P)$ )对数的线性回归系数<sup>⑥</sup>。在回归分析中, 首先假定女性失业与地区市场化无关, 将女性和年龄、教育作为微观层面变量进入模型用进行估计; 然后将两个微观—宏观交叉变量加入, 以估计两性就业差异与地区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 6 研究发现和解释

表 1 给出了按照 30 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分列的城市非农户籍常住劳动人口的失业率和由大到小排列的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表 1 显示, 从全国来看, 女性失业率比男性失业率高 2.32 个百分点。该表第五栏“两性失业率差”表明, 除了福建、海南、广西、贵州, 各省份女性失业率都比男性失业率高。但是, 从直观上看, 各省市自治区的两性失业率差与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

表 1 城市非农户籍常住劳动人口失业率(%)和地区市场化指数(1999)

地区别	(I) 失业率	(II) 女性失业率	(III) 男性失业率	(II) - (III) 两性失业率差	地区市场化 相对指数
全国	13.04	14.35	12.03	2.32	
广东	14.12	14.35	13.94	0.41	8.01
浙江	10.35	10.35	10.35	0.00	7.97
福建	12.09	13.30	11.17	2.13	7.86
江苏	10.68	12.14	9.50	2.64	7.79
山东	6.83	8.38	5.59	2.80	6.99
天津	17.22	19.36	15.68	3.68	6.40
上海	14.52	16.25	13.31	2.94	6.38
海南	16.67	14.52	18.33	-3.82	6.38
安徽	13.47	15.70	11.78	3.92	6.34
河北	8.79	9.58	8.17	1.40	6.33
重庆	17.64	19.49	16.20	3.29	6.21
辽宁	20.94	24.98	17.75	7.23	6.08
广西	15.27	12.47	17.38	-4.92	5.96
四川	13.54	14.95	12.54	2.41	5.53
河南	11.66	12.77	10.76	2.01	5.51
湖北	13.93	15.66	12.59	3.06	5.45
湖南	13.20	13.91	12.64	1.27	5.41
吉林	16.27	17.76	15.14	2.62	5.39
北京	7.97	8.38	7.64	0.74	5.37
江西	13.00	13.33	12.75	0.59	5.03
甘肃	10.84	11.25	10.51	0.74	4.91
黑龙江	16.94	18.21	16.04	2.16	4.85
云南	8.75	10.91	7.10	3.81	4.72
内蒙古	12.32	14.29	10.83	3.45	4.63
山西	9.31	11.91	7.39	4.52	4.51
贵州	11.50	11.04	11.85	-0.81	4.46
陕西	9.58	9.58	9.58	0.01	4.00
宁夏	10.38	13.71	7.72	5.98	3.89
青海	14.78	15.63	14.21	1.41	2.93
新疆	9.88	10.46	9.40	1.06	2.34

资料来源: 城市非农户籍劳动者失业率来自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 0.95% 抽样数据; 地区市场化指数来自樊纲等(2003, 见参考文献[15])。本表不含西藏的数据。

表2展示了样本的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分布。从总数上看,在城市非农户籍常住劳动人口中,女性的比重略低。在45岁以上的劳动者中,女性的比重大大低于男性,这是现行的退休制度的后果。同男性相比,女性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人数比例要明显低,但只有初中或初中以下学历的女性的比重低于女性劳动力的总比重。

表2 城市非农户籍常住劳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分布

项 目	男性		女性		样本量合计
	样本量	%	样本量	%	
年龄					
15至25岁	6142	49.78	6197	50.22	12339
26至35岁	15282	53.09	13503	46.91	28785
36至45岁	15859	55.23	12858	44.77	28717
45岁以上	11098	70.37	4674	29.63	15772
教育程度					
小学及小学以下	2789	58.15	2007	41.85	4796
初中	16799	58.40	11965	41.60	28764
高中	12354	54.95	10130	45.05	22484
中专	5154	48.68	5434	51.32	10588
大专	7232	56.50	5569	43.50	12801
本科及本科以上	4053	65.58	2127	34.42	6180
总计	48381	56.51	37232	43.49	85613

表3列出了失业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显示,在控制了年龄和教育程度、但不加入微观—宏观交叉变量时,女性失业的事件发生比为男性失业的事件发生比的114.15% ( $e^{0.1323}$ ),即高14.15%。这说明,假定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两性就业(失业)差异不构成影响,在年龄和学历相同的条件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失业。

表3 城市非农户籍常住劳动人口失业的Logistic回归系数

变量	模型1	模型2
女性(男性=0)	0.1323***	.2149***
女性×(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5.45)		0.0257
女性×(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5.45) <sup>2</sup>		-0.0568***
年龄(“15至25岁”为对比项)		
26至35岁	-1.1281***	-1.1270***
36至45岁	-1.1359***	-1.1404***
45岁以上	-1.7318***	-1.7369***
教育程度(“小学及小学以下”为对比项)		
初中	0.0258	0.0066
高中	-0.3494***	-0.3661***
中专-1.0067***	-1.0279***	
大专	-1.5529***	-1.5706***
本科及本科以上	-2.4237***	-2.4439***
常数项	-0.5119***	0-0.4927***
个案数	85613	85613
Model Chi-square	5437.491	5505.371
-2 Log Likelihood	60852.282	60784.40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0.95%抽样数据;\*\*\* P<0.001

模型2放弃了“两性就业差异与地区市场化程度无关”假设,加入了女性与市场化的两个微观—宏观交叉变量。根据这一模型的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回归系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女性高于男性的失业可能性是由 $0.2149 - 0.0568 \times (\text{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 - 5.45)^2$ 决定的。这样,两性失业差异与地区市场化程度构成二次曲线(抛物线)关系:在市场化慢于湖北(中位数)的省份,市场化程

度越高, 女性越容易失业; 在市场化快于湖北的省份, 市场化程度越高, 女性越不容易失业; 在湖北, 女性最可能失业, 女性失业的事件发生比为男性失业的事件发生比的  $124.53\% (e^{0.2149})$ , 即高  $24.53\%$ 。这一结果似乎强有力地支持假设命题 1, 即肯定文化歧视与市场机制交互作用的观点。

但是, 对样本的进一步分析表明, 失业差异与地区市场化的曲线关系并不适用于所有女性。表 4 提供了在不改变表 2 模型的情况下(表 4 见第 8 页), 按照教育程度对样本进行分类、分别做回归分析的结果。对初中以下的劳动者而言, 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两性就业差异没有影响; 对初中和高中学历劳动者而言, 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两性就业差异的影响分别为两条抛物线, 关系模式与表 2 所显示的类似; 对中专学历劳动者而言, 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两性就业差异的影响关系仍为抛物线, 但女性地位优越——无论在什么省份, 中专毕业女性的失业机会总是不高于同学历男性劳动者的失业机会; 对受过大学教育(大专或以上)的劳动者而言, 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两性就业差异没有影响。这一组结果意味着, 在城市女性劳动者中, 只有初高中女性超出男性的失业机会与地区市场化构成曲线关系。这无法用“文化歧视—市场机制互动”观来解释, 因为基于文化传统的性别歧视不会只影响部分女性劳动者的就业。然而, 表 4 的分析结果可以从新兴市场机制对政府再分配安排的冲击上寻求解答, 因为初高中毕业的劳动者都属于中低学历, 又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劳动力主体。表 4 中关于初高中学历女性的独特发现拒绝了假设命题 1, 同时支持了假设命题 2。在表 3 中, 有关小学或更低学历劳动者的统计结果似乎不支持假设命题 2。但考虑到这一群体在城市劳动力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为样本的  $5.6\%$ , 而初高中劳动者占到样本的  $59.86\%$ ), 该结果可能不具有代表性。

表 4 还提供了另外一些结果。对城市劳动者说, 当其他条件相同时, 年龄降低失业的可能性, 而且这种降低作用在 45 岁以后更为明显。这表明, 城市失业问题对中青年的压力较大。从高中学历起, 教育程度降低失业的可能性, 而且教育的这种效应突出表现在高等教育群体上。这里显示了教育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

## 7 结论和讨论

文化性歧视、政府再分配和市场机制都可能影响两性的就业不平等。然而, 从本文关于失业性别差异的实证发现中, 看不到以文化传统为基础的性别歧视的迹象。这意味着, 从就业角度来看, 歧视女性的文化意识并没有随着经济转型“复兴”; 对此,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仅仅全面实施和贯彻 20 余年的计划经济的劳动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已经消除或基本上消除了文化传统对就业的影响。对两性就业不平等的影响来自新旧体制——市场和再分配安排的互动, 但这一影响也是局部的, 局限于作为城市劳动主体的中低学历女性。对于拥有大学文凭的高学历劳动者来说, 无论是否考虑地区市场化差异, 都没有观察到就业的性别不平等。这说明对这个群体而言, 就业的性别不平等有自身的逻辑, 与市场化无关。以上结论的政策涵义是: 对中国女性劳动者就业前景的展望是乐观的, 城市女性会逐渐适应市场, 市场也会不歧视地接纳女性, 这就是今天在市场化的前沿省份发生的事情。当然, 无须赘言, 本文结论是初步的、暂时的。由于所使用资料的限制, 笔者未能在回归模型中控制经济部门或所有制变量, 还有其它未曾涉及的视角。在这一研究方向上, 还需要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进一步积累。

如果本文的发现得到更多的确认, 如果在收入以及其他方面的性别差异与地区市场化关系的研究也获得与本文结论类似的发现, 则意味着: 第一, 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歧视女性的文化已经终结了; 第二, 旧体制下的国家再分配制度安排对两性差别的影响是局部的、暂时的。因此, 新兴的市场经济在中国没有导致或诱发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这样, 在中国的性别不平等研究上, 社会科学家的兴趣将可能从重视文化性歧视、再分配和市场转向揭示和理解性别不平等的“自身的逻辑”, 从而把这一领域的理论探索推向新的范式。

表4 按学历分类城市非农户籍常住劳动人口失业的 Logistic 回归系数

变 量	小学及小学以下		初中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女性(男性= 0)	- 0.0786	- 0.0420	0.1927***	0.3131***
女性×(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 5.45)		0.0278		0.0212
女性×(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 5.45) <sup>2</sup>		- 0.0236		- 0.0790***
年龄(“15至25岁”为对比项)				
26至35岁	- 1.0771***	- 1.0808***	- 1.0799***	- 1.0754***
36至45岁	- 1.2378***	- 1.2421***	- 1.1044***	- 1.1067***
45岁以上	- 2.0452***	- 2.0510***	- 1.5444***	- 1.5475***
常数项	- 0.2766*	- 0.2723	- .5660***	- 0.5660***
个案数	4796	4796	28764	28764
Model Chi- square	203.669	204.343	1035.560	1092.645
- 2 Log Likelihood	3747.532	3746.859	26548.637	26491.553

变 量	高中		中专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女性(男性= 0)	0.1966***	0.2313***	- 0.1619*	- 0.0209
女性×(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 5.45)		0.0669*		- 0.0100
女性×(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 5.45) <sup>2</sup>		- 0.0396**		- 0.0817**
年龄(“15至25岁”为对比项)				
26至35岁	- 1.0824***	- 1.0801***	- 1.0570***	- 1.0601***
36至45岁	- 0.9371***	- 0.9363***	- 1.6852***	- 1.7050***
45岁以上	- 1.5649***	- 1.5663***	- 2.4171***	- 2.4246***
常数项	- 0.9998***	- 0.9985***	- 1.2669***	- 1.2645***
个案数	22484	22484	10588	10588
Model Chi- square	580.451	590.787	584.185	601.751
- 2 Log Likelihood	18205.871	18195.535	6375.084	6357.482

变 量	大专		本科及本科以上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女性(男性= 0)	0.0485	0.1357	- 0.2473	- 0.03455
女性×(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 5.45)		- 0.0569		0.0209
女性×(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 5.45) <sup>2</sup>		- 0.0358		0.0435
年龄(“15至25岁”为对比项)				
26至35岁	- 1.4464***	- 1.4498***	- 1.4690***	- 1.4727***
36至45岁	- 1.5771***	- 1.5841***	- 1.8418***	- 1.8384***
45岁以上	- 2.3999***	- 2.4075***	- 2.6171***	- 2.6152***
常数项	- 1.7687***	- 1.7652***	- 2.4125***	- 2.4117***
个案数	12801	12801	6180	6180
Model Chi- square	359.509	364.604	63.428	64.095
- 2 Log Likelihood	4716.695	4711.599	1096.597	1095.930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 0.95% 抽样数据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注释:

① 在比较社会学研究中,改革前的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国家被定义为“再分配经济”:国家废除劳动力市场,通过等级行政体系集中社会产品,然后进行再分配。参见 Nee (1989)<sup>[5]</sup> 和 Szeleni (1978)<sup>[6]</sup>。

② 参见本文表 1。

③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长表由抽样获得的百分之十的户填报。见国务院.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N]. 人民日报, 2000-01-26。

④ 根据“五普”长表问卷设计和本文定义,“迁移”是指 1995 年 10 月 31 日以后常住地的变更。由于这样定义“迁移”,这一时点以前的迁移者将被视为未迁移人口。因此,“常住人口”实际上包含了一些五年前的(跨市)迁移的人口。

⑤ 本文的研究对象不含离退休者,因此没有设立年龄上限,这样可以把超过正常退休年龄、但依然活跃在劳动力市场的城市人口包括进来。

⑥ 这里, P 定义为“进入垄断产业的可能性(概率)”,因此,“事件发生比”即发生概率对不发生概率的比率。

## 参考文献:

- [1] [13] Liu, Pak-Wai, Xin Meng & Junsen Zhang. Sectoral gender wage differentials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Chinese economy. *Journal Population Economics* 13: 331-352, 2000.
- [2] Lee, C. K. Engendering the World of Labor: Women Workers, Labor Markets,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Economic Mirac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251-275, 1995.
- [3] Honig, E. Iron Girls Revisited: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Work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 In B. Entwistle & G. E. Henderson (Eds.), *Re-Drawing Boundaries: Work, Households, and Gender in China* (pp. 97-1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4] Hershatter, G. Local Meanings of Gender and Work in Rural Shanxi in the 1950s. In B. Entwistle & G. E. Henderson (Eds.), *Re-Drawing Boundaries: Work, Households, and Gender in China* (pp. 79-9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5] Nee, Victor.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663-681, 1989.
- [6] Szeleni, Ivan.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Dilemmas for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 Socialist Societies of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 63-87, 1978.
- [7] Zhou, X., Tuma, N. B., & Moen, P. Stratification Dynamics under State Socialism: The Case of China: 1949-1993. *Social Forces* 74: 759-796, 1997.
- [8] Shu & Bian. Intercity Variation in Gender Inequalities in China: Analysis of a 1995 National Survey.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19: 269-312, 2002.
- [9] 蔡 (主编).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转型中的城市贫困问题 [R].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10] Lin, Justin Yifu, Fang Cai, & Zhou Li. *The China Miracl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1] 潘锦棠. 经济转轨中的中国妇女就业与社会保障[J], 管理世界, 2002, (7).
- [12] 蔡 (主编).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城乡就业问题与对策 [R].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14] 边燕杰, 张展新. 市场化与收入分配[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5).
- [15] 樊纲, 王小鲁, 张立文, 朱恒鹏.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 经济研究, 2003, (3).
- [16] Meng, Xi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国际研讨会论文, 北京, 2001-12-16-18.
- [17] 蔡, 都阳, 王美艳. 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 经济研究, 2002, (12).

[责任编辑: 任强]